



陆洪恩的肖像以及陆洪恩的儿子和《风雨人生路》作者刘文忠

## 陆洪恩被害 37 年后

王友琴

陆洪恩先生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1966年被逮捕，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宣判死刑杀害。

关于陆洪恩先生在文革中受难的文章，我是在2001年写成的。文章先放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后来印入2004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书中。感谢一位年轻的理科教授，他在很小的时候见到过在深深忧郁中的陆洪恩的妻子。他一直认为应该记录陆洪恩的故事。看到我写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一些文章后，他找到了我。他还帮助联络到陆洪恩的亲戚，找出了陆洪恩的照片。遗憾的是，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我们没有能找到任何人了解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从他被抓进监狱到被判死刑杀害，有23个月的时间。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遭到杀害的事情，使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为之扼腕。他是中国最好的交响乐团的指挥，艺术家；在文革前曾经发过精

神病的人；在乐团的会上直言说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就被抓进上海监狱；在被关押期间多次被押到监狱外的“斗争会”上遭侮辱和毒打；最后，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没有审判过程也没有上诉手续，就被杀害。

迫害文化艺术界人士，把精神病人的话当作“反革命”言论，把人们的政治意见作为罪证判处重刑甚至死刑，残酷的暴力性“斗争会”，这些都是文革中由上面指挥而普遍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陆洪恩是典型的文革受难者，是文革受难者的代表和象征。他的恐怖遭遇，说明了文革的目标、方向、性质以及文革有多残忍。

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写了659名受难者，其中上海交响乐团的人还有顾圣婴。这位三十岁的女钢琴家1967年1月31日在该乐团的“斗争会”上遭到野蛮殴打与侮辱，当晚与母亲以及弟弟顾握奇一起在上海愚园路1355弄73号家中开煤气自杀。她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弟弟是上海天山中学的数学代课老师。

出版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顾圣婴母亲的名字。后来一位读者来信说，顾圣婴的母亲名叫秦慎仪，早年毕业于大同大学西洋文学系。另外，还有一名读者来信说，在文革中，上海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演奏家周杏蓉受迫害自杀身亡。

我收到关于周杏蓉的信后，设法了解详情而不得进展。有读者自告奋勇伸手相助，找到了周杏蓉的丈夫的电话号码。那位帮助者要求见面谈话被拒绝了。于是我自己打了两次电话去，唯一了解到的是周杏蓉在1968年天气刚开始冷的时候身亡。（那是10月吗？我无法确定。）至于别的情况，老人坚持要求我到上海交响乐团向“组织上”去问，如同他告诉那位帮助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的人一样。

受难者家人的这种态度并不常见，然而也并不少见。这种态度很可以理解。他们的亲人被害死，而且文革的株连政策也让他们自己受到迫害。经历了那样大的恐怖和伤害后，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心理治疗，而且继续生活在不准谈论文革历史的压力下，所以会有这样的回避反应。

因此，至今还不知道周杏蓉的死亡日期以及是怎么死亡的，也不知道除了陆洪恩、顾圣婴和周杏蓉，上海交响乐团在文革中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这表明现有的关于文革历史的记录无情无义无知，甚至显得荒诞。因为那是上海，中国最为技术发达通讯便捷的城市，那是交响乐团，是最顶尖的文化团体，而且他们本人是著名艺术家。如果连他们的死亡都被如此忽略和遗忘，别的人呢？

同为文革受难者，陆洪恩与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有所不同，他是被判处死刑后杀害的。当时最后决定死刑的机构，不是最高法院，而是文革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2004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帮”中的两个）徐景贤出版了《十年一梦》。“十

年”指的是文革。这是一本四百多页的文革回忆录，书中没有提到陆洪恩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别的上海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上海文革害死了多少人？一项内部统计说有11,150人。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上海当时有职工二百万人。也就是说，每二百人中有一名被害死。但是在文革领导人的眼睛里，受难者们不值一提，更不用表示任何歉意，哪怕是假装的歉意都不必表示。

2005年2月底，我收到了新印出的刘文忠先生写的《风雨人生路》一书。整本书有481页。刘文忠先生是上海人。他的哥哥刘文辉，1966年9月写了一篇反对“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文章，复写后匿名投寄给十四所著名大学。在立即开始的严密的追查下，刘文辉被逮捕。1967年3月28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刘文忠当时19岁，因协助其兄投寄了十四份反对文革的信，被先后两次关进监狱，共被关押了13年。

在书中，刘文忠写到了陆洪恩。书中有三章是写陆洪恩的。

刘文忠在1966年11月被逮捕后，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他曾经和陆洪恩关在同一监房。陆洪恩的囚犯号码是1598。

刘文忠记忆，1967和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界“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纷纷到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有名望的人拉出去“批斗”。陆洪恩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被拉出去“批斗”。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被打得鼻青脸肿。他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时，他反驳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关于音乐的说法，在台子上遭到毒打。造反派说他“满嘴放毒”，竟撕裂了他的嘴唇。

书中说，由于陆洪恩“被揪斗频繁，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前次老伤未好，后面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脚步，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时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又肿又胀，疼痛刺骨钻心。他刚松铐几天又被立即铐上，长时间地遭到内外摧残。看守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1598每次批斗，每次不老实放毒，非得反铐不可！’批斗，毒打，反铐，这样几个月下来，这位身体本来纤弱的中年学者背已弯驼，头发从全白到脱落。”（132页）“这位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二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呆木般的比一个九十岁老翁还衰老。”（134页）

书中说，和陆洪恩在同一监房的人多次劝他隐忍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以后还能有机会出去。陆洪恩总是苦笑着摇头。后来，他发高烧，讲胡话，精神意识失控了。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见到有“毛”的东西就咬，毛巾，毛衣，毛裤……。

1968年的一日，监狱把他们监房里的14个囚犯叫到“训导室”坐在地上，训导员训斥陆洪恩“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凶狠地问：“1598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书中第136页：

训导室内仅仅沉默了一两分钟。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人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他根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热血沸腾地冲天长啸、滔滔不绝地直抒胸臆，一口气演说了二十多分钟，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口若悬河，激扬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连主持逼审他的那三个人也目瞪口呆地听他连珠炮似的演讲，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竟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

刘文忠先生看了墙上的挂钟，知道陆洪恩足足演讲了25分钟。陆洪恩的演讲尖锐地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狱方记录了他的谈话，并叫三四个囚犯签字作证。

在这个演讲一个星期之后，陆洪恩被带出了他们的监房。四天以后，他的难友们看到了《解放日报》头版陆洪恩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消息。（这张报纸的照片，可在《文革受难者》书中看到。）

在陆洪恩被带出这间监房之前，告诉了刘文忠他家的住址，说他家中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请刘文忠将来能去告诉家人他是怎么死的。

先前曾经有一名读者告诉我，陆洪恩家原来住北京西路129弄。一个楼梯上去是左右两家人。陆家的邻居是京剧演员包幼蝶，也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

在皇帝时代，判决死刑可以上诉，整个判决规程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被处死的犯人也允许家人探望和收尸。像文革这样杀人的，不能说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现在说到文革发生的原因，常有人说到中国传统，其实了解历史的话，会知道文革的很多做法并非模仿古代。对文革的残酷和野蛮，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解释。

刘文忠先生在书中非常痛心地说，他第一次出狱以后，照着陆洪恩生前留下的地址，去他家中，只见门关铁锁，杳无人影。听邻居说，他家人已经被扫地出门了。

读到这里，我立即给在上海的素不相识的刘先生打了电话。我告诉刘先生，我知道怎么能找到陆洪恩的儿子。虽然我没有能和他的儿子直接谈过话，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他会想要听到您所知道的。

刘文忠先生说，他会马上去找陆洪恩的儿子。他还说，据他的观察，陆洪恩平常是个神志清醒非常聪明而有思想的人，完全不是个疯子。他只是那种有时候会精神失

常的人。他非常钦佩陆洪恩。刘文忠认识陆洪恩的时候是 19 岁。在书里他说，多位监狱中遇到的比他年长的“反革命犯”（那时候不准说“政治犯”）的思想和为人方式给予他的印象和教育。

三天以后，我收到了刘文忠先生的电子信。他说，他已经找到了陆洪恩的儿子。他们谈话。他们抱头痛哭。刘先生还说，他终于完成了陆洪恩先生 37 年前的遗愿和嘱托。

我感激刘文忠先生。他重然诺，讲义气，办事认真，行动敏捷，完成了陆洪恩先生的遗托。他在文革后艰难谋生创业，而且写出了一本书，纪念他的兄长刘文辉，也纪念陆洪恩和别的文革受难者。

我也为陆洪恩的儿子感到欣慰。四年前他没有能和我直接谈话，显然是因为那时还有障碍。现在他能向刘文忠先生敞开心扉，显然是在精神上他已经从文革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了。

我也感叹，现实中有这样惨烈的故事，有这样鲜明的性格，有这样曲折的情节，有这样长久的坚持，有这样顽强的努力，简直像是在经典戏剧中表现过的一样。我想起 1990 年代获得奥斯卡奖的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那是一部关于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的电影，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由演员来扮演而已。那个电影动人而且有深度。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作这样的电影呢。

刘文忠先生还传来了一篇文章，以及他和陆洪恩儿子的合影。在照片上，陆洪恩儿子手中的，是他画的陆洪恩的肖像。在刘文忠手中，是他的书《风雨人生路》。请读者们阅读这篇文章。如果您能提供更多有关信息，请您协助为盼。

\*\*\*\*\*

## 一桩等了三十七年才完成的遗托

刘文忠

1966 年我因参予哥哥刘文辉书写反“文革”十六条反革命罪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四个月后我哥哥成了文革中惨遭公开枪杀的第一人。我坐牢时结识了难友上

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一直相处到68年4月，看着陆先生走上断头台。陆先生在临刑前留下遗托给我：“小兄弟如能出狱的话，请详尽转告我儿子，我是如何死在监狱里的。”69年我第一次出狱戴反革命帽子管制在厂时，冒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照着他生前留给我的地址，偷偷摸到北京新村一个叫望德堂的天主教堂旁的住宅，不料见门铁锁，杳无人影，不知他的儿子去哪里了。后听邻居说，他16岁儿子已被发配去了新疆，妻子已扫地出门被赶走了。当时我含泪长叹：“陆先生，我没有完成你的遗托，你家属正遭受株连。我真想对你儿子说：年轻人啊，你父亲死得好惨啊！但他斗争到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完成陆先生的遗托。以后我又进了监狱，十三年后九死一生获平反，时间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

2004年11月我在港澳地区出版了自己的传记文学《风雨人生路》里面有二节详细叙述了这位音乐家最后走上刑场的一幕，及我寻他儿子的经历。不久我的书被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文革死难者纪念馆》的主办人王友琴女士读到，她来电告知了我一直想寻找的陆洪恩儿子的信息。我又通过另一位当年难友陈古魁（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找到了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他们是一个文化系统。事隔三十七年，当我向陆于为叙述他父亲遗托和临死前这段牢狱惨状时，这位五十五岁的画师，一边听一边眼眶涌出一串串泪水。他痛苦的说：“三十七年过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静、认命的生活被我的讲述掀起了波澜，心灵被震撼。这几天他反复读了《风雨人生路》，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他一再含泪说：“想不到父亲死得这么惨，这么苦，这么壮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对“文革”遗忘得这么快！“他一再感谢我对他父亲临死前几个月的照顾和有胆量如实写出这么珍贵感人的历史事实。陆于为给我看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和别人写的回忆文章。对着相片上这位四十七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1968年监狱里的那个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俨然古稀老人的信仰天主教的音乐家陆洪恩。二年不到，牢狱把他折磨得截然两个人形。

陆于为痛苦的回忆，1966年5月28日这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文章，父亲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他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因为他听母亲说，26日学习时，由于爸爸讲了一些不应讲的真话遭到批判。父亲轻轻摸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那是个阴霾密布的早晨，他目送父亲一步一回头走出家门，谁能料想，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夜里单位同事来告诉我们，这天他在别人不断围攻批判他修正主义思想时，父亲耿直、倔犟、宁折不弯的品性又一次仗义执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语惊四座。他正义怒吼：“我看不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万岁。”后来父亲直接被单位扭送进公安局。当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学校教钢琴的母亲遭了殃，我受株连，三个月后被发配去了新疆。那时我十六岁。十三年后，1979年9月父亲被平反，落实政策后我才批准回上海。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1981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

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尽管我目前生活平静，但“文革”这恶梦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畏，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腥风血雨。

陆于为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 68 年 4 月 20 日这天，陆洪恩最后向政府表态，甘愿做义士去死的演讲一幕。由于陆洪恩在监狱犯了所谓“攻击诬蔑毛泽东的防扩散言行”，政府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正义怒吼：“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请看书 中陆洪恩死前的表态一章。）这位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大义凛然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疯狂泯灭了人性和真理的“红色恐怖”年代，他悲惨命运的开始一幕与死亡闭幕，惊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